"挺经"蠡测

李　乔

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,写过一部有名的笔记,叫《水窗春呓》,里面写了不少关于曾国藩的史事。在"一生三变"这条笔记里,有这样一句话:"(曾国藩)尝自称欲著《挺经》,言其刚也。"关于曾国藩的"挺经",曾国藩的孙婿吴永,在所著笔记《庚子西狩丛谈》卷四中也曾谈及,他记李鸿章曾对他说:"我老师的秘传心法,有十八条'挺经',这真是精通造化、守身用世的宝诀。"(下引此书时皆见卷四)李鸿章所说的老师,就是曾国藩。曾国藩是否确曾著过《挺经》呢?从这里举出的两条笔记看,似有两种可能:一是著过;一是仅仅有腹稿。若是著过,大概也只是自藏本,因为从未见过有《挺经》流传。但曾国藩有"挺经"心法,则当是确实的。因为上举两条笔记,都是出自与曾国藩极接近之人的手笔。

"挺经"的内容是什么呢?李鸿章说有十八条。但他只举出了一条,即吴永在《庚子西狩丛谈》里所记的李鸿章亲口向他讲的一条。李鸿章说道:

> 我试讲一条与你听:一家子,有老翁请了贵客,要留他在家午餐。早间就吩咐儿子,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,日已过巳,尚未还家。老翁心慌意急,亲至村口看望,见离家不远,儿子挑着菜担,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,彼此皆不肯让,就钉住不得过。老翁赶上前婉语曰:"老哥,我家中有客,待此具餐。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,待他过来,你老哥也可过去,岂不是两便么?"其人曰:"你叫我下水,怎么他下不得呢?"老翁曰:"他身子矮小,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,坏了食物;你老哥身子高长些,可以不至于沾水。因为这个理由,所以请你避让的。"其人曰:"你这担内,不过是菜蔬果品,就是浸湿,也还可将就用的;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,万一着水,便是一文不值。这担子身分不同,安能叫我让避?"老翁见抵说不过,乃挺身就近曰:"来来,然则如此办理: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,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与我,我顶在头上,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,再将担子奉还。何如?"当即俯身解袜脱履。其人见老翁如此,作意不过,曰:"既老丈如此费事,我就下了水田,让尔担过去。"当即下田避让。他只挺了一挺,一场争竞就此消解。这便是"挺经"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。

曾国藩的这一条"挺经",是李鸿章转述的,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表达的。这条"挺经"的含义是什么呢?颇有些费解。吴永虽是当面听李鸿章讲的,但他也觉得"意用何在,亦殊不甚明白"。经过一番推敲琢磨,他推测这条"挺经"的意思是:"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,总是无益,必须躬自入局,挺膺负责,乃有成事之可冀。"(《庚子西狩丛谈》)这个推测,很难说准确,因为从故事里很难明确看出这层意思。吴永自己就说他的看法是"臆度之词"。但也很难说就没有吴永推测的这层意思。因为这条"挺经"虽然说的是一个具体故事,实际含义却很抽象,所以似乎做怎样的解释都有些道理。今人黄裳对这条"挺经"也做了些解释,主要是强调它表达了一种"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"的策略,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"得心应手地运用黄老之道的高手"(《妆台杂记·关于挺经》)。

我觉得，欲解“挺经”，不可拘泥于李鸿章转述的这个故事，而是须从更广些的方面加以考察。

先说“挺经”二字。“挺经”，意即言“挺”之经。“挺”，是所言的内容；经，指关于“挺”的原则、经验、秘诀。何谓“挺”？我认为“挺”是指一种立身状态、处世态度，即李鸿章所言的“守身用世”的态度。具体说，“挺”就是指刚烈强硬、坚劲挺拔这样一种立身、处世的态度。本文开头所引的欧阳兆熊的话里，有“言其刚”三字，这“刚”字，可以说是对“挺”字的确诂。同时，“言其刚”三字也是对整个“挺经”内容的解说和概括。“挺”者，刚也；“挺经”者，刚之经也。这个精简的解释，大抵是近乎曾国藩原意的。

李鸿章对“挺经”的运用，更可以清楚地说明“挺经”是一种以刚劲强硬为特征的处世哲学。李鸿章与翁同龢闹矛盾时曾运用过“挺经”。吴永在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对此做了记述。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，与翁同龢相互排挤，对翁“怨之颇切”。一次，袁世凯作为翁同龢的说客来劝李鸿章乞休开缺，以使翁同龢能顺利顶补，做成协办大学士。《庚子西狩丛谈》记道，李鸿章对袁世凯说：

想补我的缺，万万不能？武侯言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。我一息尚存，决不无故告退，决不奏请开缺。

袁世凯走后，李鸿章又对吴永说：

袁世凯，尔不知耶？这真是小人！他巴结翁叔平，来为他作说客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要我乞休开缺，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。我偏不告退，教他想死！我老师的“挺经”，正用得着，我是要传他衣钵的。我决计与他挺着，看他们如何摆布？

从李鸿章的话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他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袁世凯，是以曾国藩的“挺经”作为处事方针的。“与他挺着”，就是以坚劲强硬的态度与翁同龢相抗衡。李鸿章对“挺经”的具体运用，可以说是对“挺经”涵义的极好注释。李鸿章自诩是要传曾国藩“挺经”的衣钵的，想必他对“挺经”内涵的理解，是比其他人要准确得多。

“挺经”是一种以刚劲强硬为特征的处世哲学，还可以以曾国藩一贯的处世哲学为佐证。姑举曾国藩的几段家书，以见其一贯的处世哲学。

其一、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沅弟信：

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图自强，因引谚曰：“好汉打脱牙，和血吞。”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，不料被申夫看破。余……打脱牙之时多矣，无一次不和血吞之。弟此次郭军之败，三县之失，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。来信每怪运气不好，便不似好汉声口。惟有一字不说，咬定牙根，徐图自强而已。

其二、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致沅弟信：

然事已如此，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，仍不外悔字诀、硬字诀而已。

其三、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致澄弟信：

余意此时名望大损，断无遽退之理；必须忍辱负重，咬牙做去……（《曾国藩与弟书》）。

从这三封家书中，足可领略曾国藩平时的处世哲学。这种以刚劲强硬和坚忍为特色的处世哲学，与“挺经”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云“打脱牙，和血吞”，“咬定牙根”，“咬牙做去”，“硬字诀”等等，可以说就是“挺经”的注脚。家书里的这些话，其实既是曾国藩的处世哲学，也是曾国藩的性格的直接反映。曾国藩的性格，是“挺经”产生的主要渊源之一。

曾国藩发明“挺经”，又与他实行“法申韩”的治术有关。“法申韩”，即尊奉申韩法家烈日秋

霜的治国治军治民之术。“挺经”之“挺”(刚劲强硬),与法家的烈日秋霜是相通的。曾国藩发明“挺经”,大概深受了申韩法家的影响。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:做京官时讲理学;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;做了大官后学老庄(《水窗春呓·一生三变》)。如此看来,曾国藩发明“挺经”之时,或是使“挺经”臻于成熟之时,很可能是在他办理团练军务那一段时间。曾国藩“法申韩”的治术,可于以下两段书信中大略见之。

其一、致徐玉山太守信:

> 但求于孱弱之百姓,少得安帖,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,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,亦不敢辞。(转引自谢兴尧《堪隐斋随笔·谈曾国藩》)

其二、致沅季两弟信:

> 既已带兵,自以杀贼为志,何必以多杀为悔。(《曾文正公家书》卷七)

曾国藩如此“法申韩”,便得了个“曾剃头”的绰号。曾国藩大剃人头,大概既是孕育他发明“挺经”的酵母,也是他发明“挺经”后对“挺经”的实践。

回过头来,再来诠解李鸿章具体举出的那条“挺经”。这条“挺经”,其基本思想,其骨子里,无疑是“挺”,即刚劲强硬。因为这条“挺经”只是整个“挺经”的具体的一条,其主旨自然是合于整个“挺经”的主旨的。从故事表面看,似乎老翁是让了一步,但实质上,老翁的精神是刚劲强硬的,是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的,是用“挺”的精神来克服困难的。故事里说的老翁“挺身就近曰”,老翁“只挺了一挺,一场争竞就此消解”,就都透露出老翁是以“挺”的精神,即刚劲强硬的精神来解决这场争竞的。但是,从具体战术上说,老翁又有一点灵活性,讲了一点策略,结果是“退一步,进两步”,目的达到了。这个策略,就是黄裳所谈到的“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”。从这一点上看,“挺经”是搀杂了一些黄老之道或老庄哲学的色彩的,是刚中有柔的,或者说是“以刚为本,兼有柔术”的。欧阳兆熊说曾因藩“一生三变”,先理学,后申韩,再后老庄;似乎奉申韩与奉老庄是截然分开的,是先刚而后柔。实际上,曾国藩的所谓“一生三变”只是主要倾向,他在奉申韩时,未必完全不要老庄,奉老庄时,也未必完全不要申韩。刚与柔,并不是截然分开的,而往往是一个为主,另一个为辅的。

(作者李乔: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编辑。邮编 100734)